

真真假假

谌容著





谌容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赵继良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插 图：李培戈

真 真 假 假

谌 容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 绍兴路74号)

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·625 插页 6 字数 65,000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43,000—46,600册

书号：10078·3236 定价：0.71元

“喂，您是吉祥东街公用电话吗？劳驾您给传一下五十三号的吴天湘。口天吴，天上的天……”

“您甭跟我说这些，我不认得字。”那边是个嗓门挺大的女人，“不就是五十三号二楼的老吴同志吗？一个瘦高老头儿，我认得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

“您是哪儿呀？”

“我是外国文学研究室。”

“啥？您是外国，哪儿？”

“喂，喂，您就说我姓杨，我叫杨昌明。杨……”

“行嘞！您候着吧，我这就叫去！”

杨昌明一手拿着话筒，一手抄起鸡毛掸子，漫不经心地掸着桌上的灰尘。

“喂——”

那边接电话的人来了。

杨昌明赶紧放下鸡毛掸，双手捧着话筒，声音里带着尊敬：

“您是天湘同志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声音是宏亮的。

“我是杨昌明呀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明天上午九点钟开会。”

“不是已经发了通知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”杨昌明解释道，“这次会议，院党委非常重视，党委办公室的吉主任要亲自参加。他要我务必再电话通知一次。”

那边没有说话。

杨昌明又进了一步：

“天湘同志，您明天最好早一点来。这个会还得您主持。”

“你是支部书记，党委布置的学习，当然由你主持。”

杨昌明急了，两手把话筒攥得更紧，好象这就是吴天湘的胳膊，声音里也带出恳求的意味：

“天湘同志，您是研究室的主任。这不是一般的学习，这是批评老许那篇文章，我主持，不合适。”

“会，我参加。主持，还是你。”

对方不容分说，把电话挂上了。

杨昌明从兜里掏出块皱巴巴的手绢儿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又叫通了一个电话。

“喂，你是朱盛吗？”

“是我呀，你是谁呀？”

“连我你都听不出来了，我是杨昌明。”

“哦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杨书记，找我有什么事呀？”

“无事不敢惊动，通知收到了没有？”

“我们这里邮递员从来不出事故。喂，老杨，给透露透露，又学习什么文件呀？”

“你别装傻了，学什么你还不知道？”

“三中全会精神，四项基本原则，我完全拥护，有记录可查……”

“你真不知道，还是装糊涂？学习省委赵部长的讲话，讨论老许那篇文章。”

“哪篇文章呀？”

“你别明知故问了。上次开会传达省委的意见，你不是来了吗？赵部长点名批了老许那篇介绍西方现代派的文章呀！”

“我是研究日本纯文学的。西方现代派，跟我两码事儿。”

“朱盛，你那儿是公用电话，别瞎扯了。明天早上九点准时到。告诉你，党委办公室吉子宽亲自来参加。你可别迟到，别请假！”

“好嘞！只要今天夜里不上医院看急诊，明天我一定来。”

“喂，喂，你通知一下沈志业，他那儿没电话。”

“行啊，我给你跑腿儿。”

杨昌明放下话筒，脸上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。他觉得口干舌燥，拿起桌上的暖瓶，晃了晃，空的。他起身提着暖瓶到锅炉房去灌开水。

这外国文学研究室所在的省社会科学院，占据着一处庙宇式的古建筑。几进的大院，高大的房屋，参天的松柏，确是一个幽静的做学问的去处。只是房屋年久失修，瓦残墙断，柱漆剥

落，地面坑洼，更兼落叶秋风，很有一点萧杀的景象。

外国文学研究室属于恢复单位，几经讨论研究争夺，才在这里占了一间办公室。面积虽然不小，做个餐厅能摆下七八张桌子，作研究室来用却极不相宜。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，除了聊天，还能研究啥？鉴于文学研究多属个体劳动，吴天湘自己也是把工作室设在寝室里的。因而从外国文学研究室重建之后，就废除了坐班制度，各自在家搞自己的研究，除了开会和查找资料，谁也不到研究室来。这间办公室，实际上就变成杨昌明一人用的了。也因此，他除了“秘书”、“支书”两项重任外，又兼任了公务员、电话员、收发员、接待员等项任务。

打了开水回来，杨昌明拿起茶杯，揭开痰盂盖，把隔夜的剩茶往里一倒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。他赶紧把痰盂盖上，也顾不得沏水，又回身坐下拿起了话筒。

“喂，童童呀，我是老杨。就你们家电话好打，直通。这一上午打电话差点儿没把我累死！”

“您可真够辛苦的！”

秦童童的爸爸是省委统战部的副部长，家

里有电话。

“哎，童童，你怎么也跟那些大研究员一样，不来坐班了？”

“我有病假条儿呀！”

“你的病假条怎么那么好开？你能不能也给我开两张？”

“行啊，只要你也在兵团落下病根，十年八年的好不了，我准给你弄假条儿！”

“哎，别开玩笑。明天九点开会，你可得到。”

“敢不来吗？平常没人想起我，到了开会学习，就想起秦童童了。”

“喂，说真的，童童，你明天早点儿来，帮我打扫打扫卫生。吉主任说了，亲自来听会……”

“亲自来才好呢！叫他看看，挂名儿一个外国文学研究室，就那么一间破屋子！还怪人家不来上班，上班有地儿呆吗？”

“你哪来那么多牢骚？我可告诉你，明天的会讨论老许那篇文章。”

“我写不了文章，也不属于批判对象，没我的事儿……”

“喂，我不跟你辩论！你上叶菲家拐个弯儿，通知她一下。她那儿没有传呼电话。”

二

没有等到明天，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吉子宽就来了。

“老杨，电话都打了没有？”

杨昌明赶紧迎上去说：

“正在打。”

“好。”

年近六旬的吉子宽，虽是满头白发，却仍精力充沛。他拉过一张皮椅子，原想坐下，一看那椅子，皮子破了，囊里的旧絮和弹簧都露了出来，没敢往上坐，就改用双手扶着椅背那么站着。两眼不由自主地把四周打量了一番，微微叹口气，摇着头说：

“你们这研究室象个什么？破破烂烂，到处是灰，这办公室有几天没打扫了？简直快发霉了，可怕啊！还研究外国文学呢，这哪儿有一点外国文学的气味，有的是没落潦倒的封建文人的恶习！”

“我们这儿，卫生是差点。”杨昌明陪笑道。

“不是卫生，是这儿——”吉子宽指指自己

的脑袋说，“是思想发霉。小杨啊，你是多年的政工干部，也可以说是‘老政工’了，你可要警惕啊！不要以为现在重业务，强调出成果，就放松思想政治工作，这是不行的。这回许明辉的文章捅了漏子，绝不是偶然的。我早就说过，知识分子不注意思想改造，迟早要犯错误。你看，这才两、三年，有的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，这还不犯错误？”

杨昌明点了点头。他在吉子宽直接领导下，参加过反右派运动、反“右倾”斗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吉子宽被当作推行“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”的“黑干将”揪了出来，杨昌明也靠边站了。后来吉子宽得到“解放”，当了社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，杨昌明也在政工组里当了一名组员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吉子宽“说清楚”了，当上党委办公室主任，本想把杨昌明留在党委办公室里，杨昌明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，才分配到外国文学研究室来。在吉子宽的心目中，他是个很有希望的政工干部，可惜这几年被业务风刮的，也有点歪歪扭扭的了。

“你接着打你的电话，”吉子宽摆了摆手，“打完电话，我们再商量一下明天的会怎么开。”

杨昌明又拨了一个传呼电话。

“喂，请你找一下十八号的张维。弓长张，维特的维。什么？我是哪儿？我是外国文学研究室里。”

不料，话筒里传来一个笑嘻嘻的声音：

“喂，同志，给找张电影票嘿！”

“什么电影票？”

“你们不是什么外国的研究室吗？那还不老映外国电影儿，给找一张嘛！”

“没那事。外国文学跟外国电影扯得上吗？”

“得了，您甭蒙我！”那边嬉皮笑脸的声儿，“上礼拜六，那大庙里，映了没有？”

“是映了。可那不是我们发的票，也不是外国电影。”

吉子宽在一边听着不耐烦了。他冲着杨昌明皱了皱眉说：

“你跟他胡扯些什么！叫他传电话去！”

杨昌明把手捂住话筒，低声对吉子宽说：

“不行啊，惹翻了他，不给你叫去，怎么办！”

吉子宽气得把脸一扭，不言语了。杨昌明把手捂住话筒的手挪开说：

“好吧，下回映电影给你票，你快去叫十八

号的张维接电话。”

“您可记着，别忘了电影票！”

那边找人去了。杨昌明叹了口气说：

“现在的社会风气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连传个电话，都要附加一张电影票！”

吉子宽又皱起了眉头。他觉得杨昌明这几年也在变。一个政工干部，常常跟群众一起发牢骚，这是政治工作搞不好、政工干部说话不灵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他本想批评杨昌明几句，那边张维来接电话了。

“喂，张维同志吗？我是杨昌明呀！通知你收到了吧？”

“收、收、收到了。”张维有些口吃。

“明天上午九点开会，希望您准时到。”

“好，好，嗯，是学、学习什么……”

“学赵部长的讲话啊，党委布置我们认真讨论。”

“啊！那，主要是谈、谈老许的文章，还、还是……”

杨昌明看了吉子宽一眼，慢慢地说：

“主要当然是谈老许那篇文章。不过，也不限于老许的文章，也可以联系……”

“不可以，而是应该。”吉子宽厉声订正。

杨昌明赶紧改口，凑近话筒说：

“也应该联系自己……”

吉子宽一旁又发了指示：

“你动员他准备一下，谈谈自己的认识。”

杨昌明又对着话筒说：

“张维同志，您准备一下吧，谈谈自己的认识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是啊，都发发言嘛！明天的会，党委很重视，吉子宽同志要来参加。”

“啊，我、我……”

能用电话通知的，都通知到了。不能用电话通知的，都托人捎了口信。杨昌明这才喘口气，坐下来。

“做政治思想工作，一定要细致，要落实。”吉子宽也拉过一把木头椅子坐下来，“你看，学习通知是发了，可是学习内容没讲清楚，会上的发言没有去组织，这怎么能把会开好呢？”

“现在开会学习，都不事先安排发言。”杨昌明答了一句。

“哦？”吉子宽投去一个怀疑的眼光，“你认

为这样开会，效果好吗？

杨昌明想了想说：

“这样开会嘛！倒也好。大家没有什么拘束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思想比较活跃。当然，也有另外的一面，漫谈一通，不解决什么问题。”

“就是嘛，这种漫谈会，扯天说地，解决什么问题？还不是传播小道消息，给那些发牢骚的人提供市场？”吉子宽激动起来，“我常说，现在，我们弄得连会都不会开了。五十年代，哪有这样的会？开会，总是要解决问题，要围绕中心，闲扯也算开会？开会，要有充分准备。毛主席说的嘛，不开无准备的会。会前不安排发言，不组织积极分子队伍，这会怎么开？”

开会的这一套方法，杨昌明当然是熟知的。不但熟知，而且惯用。正因为如此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造反派就贴了大字报，要他交出“黑名单”。根据是：既然你们有“积极分子队伍”，必然有“中间分子”、“落后分子”名单。杨昌明为这事，急得差点没跳河，现在提起来，犹自心惊肉跳。

“这一套，早给批了。”他满脸的委屈。

“那是林彪、‘四人帮’的破坏！”吉子宽理直

气壮，“我们现在就是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，包括恢复党的优良会风。小杨，你不要心有余悸，你要好好地摸摸情况，排排队。在这次学习当中，谁是依靠对象？谁可以争取？谁有什么问题？都要做到心中有数。”

杨昌明坐在那儿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有苦说不出。想起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自己那多次的检查，什么“整黑材料”啊，充当“打手”啊，各种难听的话，都硬着头皮吞了下去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他坚决要求归队，就是为了远离这给抹得一团漆黑的政治工作。没有想到才过了几年安静日子，政治工作的套又架在自己的脖子上。你不干，也不由你了。

“上午的时间不多了。”吉子宽看了看表，站起来说，“下午你串串门，找积极分子布置一下明天的发言。”

三

谁是积极分子呢？

杨昌明推车走出“大庙”门口，心里还没有谱。

这一带，属于老城区，路面狭窄，人口集中，加上近来政策放宽，允许摆摊设点，更是人流如潮，拥挤不堪。修鞋的、打掌的、卖花生的、卖瓜子的、卖麻花的、卖鱼虾的、烤白薯的、捏泥人的、耍猴的、舞刀弄棍的、挂着“出口转内销”的横幅牌子推销滞销品的，国营零售店推着小车来扩大营业额的，把一条庙前街挤得水泄不通。

杨昌明推着车，走一步，停三停。形形色色的面孔在他眼前晃动，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他耳边鼓响。这一派热闹景象，倒退三年，不折不扣是一幅“资本主义复辟图”。现在确实是思想解放了，这些小商小贩组成的集市变成了国营经济有益的补充，变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是啊，思想解放是应该的。

谁是积极分子呢？

如果按照思想解放的标准来衡量的话，当然要数秦童童了。别看她是个老知青，一不懂外文，二不懂文学，凭着她爸是高干，走后门进了外国文学研究室，她还挺硬气。小秦什么话都敢说，什么问题都敢捅，而且事后证明，她都是正确的。三中全会以前，她就敢说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。“英明领袖华主席”的标准像还挂